

“20人说”“26人说”“29人说”…… 心兰书社创办者究竟有几人？

■俞光

心兰书社是瑞安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，2011年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，2015年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。但是，对于它的一个重要信息，即它的社员情况，至今仍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心兰书社影响力的判断，也有违尊重历史的基本原则。故笔者特加以考证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“20人说”是预估数 但非实际数

1998年出版的《温州市志》第2605页载：“心兰书社，清同治十一年(1872)瑞安许启畴、陈虬、陈黻宸等20多人筹资聚书，在瑞安城关心兰巷创办。”

2003年出版的《瑞安市志》第1439页载：“(心兰书社)“创始人有许启畴、陈虬、陈仲舫、陈黻宸、池竹卿、林楚卿、金雅莲20多人。”

2015年出版的《瑞安市文化志》第275页载：“创始人许启畴(1838—1886)、陈虬(1851—1903)深感瑞安地处‘浙江尽头’‘苦于读书’，与邑人陈仲舫、池竹卿、林楚卿、金雅莲等20人，倡议合筹资书，创办心兰书社。”

现竖立在心兰书社故址门口的《心兰书社》木牌则写道：“清同治十一年(1872)，瑞安先贤许启畴会同名流陈虬、金鸣昌、陈葆善、陈国桢、陈仲舫、池竹卿、林楚卿、金雅莲等20余人创办。”

上述四种说法，尽管在具体人员上有所不同，但共同之处都分别提到“20多人”“20人”“20余人”，故统称为“20人说”。此说流传甚广，为许多作者所引用，此处不一列举。

之所以有“20人说”，是因为陈虬写于1893年的《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》中提到“定议之初，人约二十家”。但是这



心兰书社

是预估数，并非实际数。遗憾的是，陈虬又将它视为实际数，以至在文中出现：“二十人中，五科之内蝉联鹊起，不可谓非稽古之力也。”这不仅造成前后矛盾，更让后人以误传误，甚至误上加误，把后来入社者都算进创办的20人之中，结果漏洞百出。

我市文史前辈余振棠先生曾在《陈黻宸在创办心兰书社吗?》一文中指出：“陈黻宸不是心兰书社创始人。”因为陈黻宸出生于1859年，至心兰书社创办的1872年，虚龄仅14岁，他16岁才认识陈虬，故不可能创办心兰书社。另外，上述记载还把“金雅莲”误为“金雅莲”，把金鸣昌与金雅莲视为两个人，其实金雅莲是金鸣昌的号。

“26人说”可信 但实际有名者仅22人

1946年出版的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卷二十七记载：“心兰书社在西河桥侧，清光绪间(沿用了陈虬《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》)中提到的时间，实为清同治十一年)许启畴等二十六人倡议合筹资书，互相切磋，邑中公共藏书者昉于此。”

潘猛补先生1989年刊于《图书馆杂志》第6期的《心兰书社及其创始者》一文指出，据《心兰书社栗主提名》，心兰书社的创始者有许启畴(雪航)、陈虬(志三)、陈国桢(仲舫)、金鸣昌(雅莲)、何迪启(苞石)、陈葆善(栗庵)、池步瀛(竹卿)、胡福臣(鹤汀)、周绍基(吟良)、郭庆昭(融堂)、王象恒(谷如)、郭庆章(梅笛)、林赞勋(楚卿)、曾庆棋(燕卿)、林乙黎(莲舫)、彭瑞龙(荇洲)、叶遇恩(声士)、周珑(伯龙)、蒋梦熊(子渭)、林仁泉(养颐)、胡黻堂(筱旆)、陈宗(燕甫)等26人(但实际有名的仅22人)。

2013年出版的《玉海遗珠》(介绍瑞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精粹)第153页提到：“心兰书社位于瑞安市玉海街道沙堤社区公园路150号，由许启畴会同陈黻宸、金鸣昌、陈虬、陈国桢、林香史、胡调元等26人合资创建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)。”

现立在心兰书社正门旁《心兰书社简介》石碑云：“心兰书社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)，创始人有许启畴、金鸣昌、陈虬、陈国桢、胡调元等26人。”

这四种说法都明确指出心兰书社创始人有26人，故统称“26人说”。但各说具体人员则有所差别。

栗主是指古代练祭时所立的神主，因神主的牌用栗木做成，故称栗主。后统称宗庙主为栗主。心兰书社栗主就是后人为了纪念心兰书社初期入社者而设立的，故它的提名应该比较慎重，而且是公开的，所以是可信的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采用了这种说法，进一步说明它得到其时学者的认可。至于提名中仅有22人的姓名，可能是提名距创办时有些年份，其余4人的姓名记不清了。

不过，后人在引用“26人说”时，也出现把此后人入社者如陈黻宸、胡调元都算进提名的26人中的现象。我市文史学者陈增童在2025年3月7日的《瑞安日报》上发表《胡调元并非心兰书社创建人》一文，指出胡调元与陈黻宸同岁，不可能创办心兰书社。此外，把提名者都称为创办者，也值得斟酌。

“29人说”已考虑后加入者 但仍有遗漏

《胡调元并非心兰书社创建人》还认为：“参与合筹资书的成员起码29人。”具体的除《心兰书社栗主提名》的26人(实际有名姓22人)外，还有周荇杉(焕文)、林汝梅(香史)、林挺芳(菊君)、张成祐(祝廷)、陈黻宸(介石)、胡调元(蓉村)、蒋星渔7人，有姓名的共29人。

笔者查对陈虬《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》的记载，上述说法还遗漏池广文(竹君)、周仲龙(拱瀛)2人，蒋星渔实其子蒋屏侯(作藩)。

总而言之，从1872年至1893年，心兰书院存在至少21年，其社员数是动态变化的。据现有资料，筹建时，初议20人，但无具体人员姓名；栗主提名时，26人，但有实际姓名的仅22人；“拟广心兰书院”时，35人，有实际姓名的31人。故后人在介绍心兰书社社员时，一定要讲清时间节点，以免前后错位，众说纷纭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两届，101名毕业生 顺泰农高 “半农半读”的岁月印记

■包建程

在瑞安的办学史上，曾有一种特殊的学校形态——“半农半读学校”。近日，笔者在马屿镇顺泰社区走访时，遇见几位从那段岁月中走过的师生。通过他们的口述，那些关于劳动与读书交织的旧日时光，渐渐浮现眼前。



顺泰农高旧址，2024年已被拆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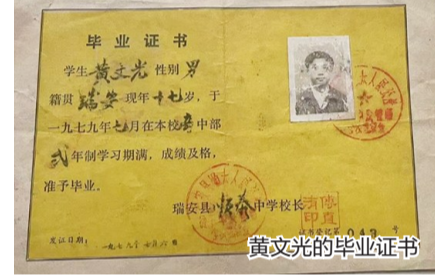
生源：来自顺泰及周边公社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瑞安县各中学招生规模有限，而初中毕业生逐年增加。为此，上级鼓励有条件的公社创办“半农半读学校”，让学生一半时间务农，一半时间读书。次年，这类学校多改称“农业高中”(简称“农高”)。在当时的马屿区，顺泰农高是最早创办的，学生主要来自顺泰公社，以及位于飞云江南岸的清祥公社，少数来自平阳坑、梅屿、荆谷等。

1976年，农高招收了一个班，共35名学生。最初，课堂设在村头大队一个叫“下店”的自然村里，借用“旗杆屋”——一座大户人家的老宅——的东轩房作为教室。据当年的学生黄文光回忆，由于那时瑞安中学在顺泰设有分校，顺泰成绩较好，家庭又能负担其在外生活费的初中毕业生中，已有15人被特许进入瑞中读书。因此农高里成绩拔尖的，多是别的公社的学生，班长也由清祥公社的学生担

任，顺泰公社的学生大多担任副职及各类委员。

那时一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相差五六岁的，也寻常可见。学籍管理也远不如现在严格，留级、转校、停学等现象常见。班主任杨凤翔记得，梅屿公社柴桥头大队有一名姓张的男生，初中毕业后被其父亲送去跟人学医，他觉得太苦，两三个月后便回到顺泰，成为农高77级的第66名学生。几年后，他考上了浙江大学。



黄文光的毕业证书

校舍：简陋的教室，没有宿舍与食堂

顺泰农高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。起初以“旗杆屋”的东轩房为教室，教师办公室设在楼上，校长、教导主任和普通教师共5人挤在一间屋里。没有文件柜，作业本和简陋的教具只能堆放在几张高低不一的办公桌上。几个月后，学校搬进附近一座教堂，第二个学期才迁入自建的校舍——那不过是5间未经装修的简易民房，前后无遮无挡。

即便如此，那里仍是顺泰人记忆中的农高校。如今原址上已荡然无存，许多六十岁以上的村民仍能清晰指认：哪里曾是教室，哪里曾是校舍。

学校没有教师宿舍，更没有学生宿舍。所有学生都走读，就连住在飞云江南岸的清祥学生也不例外。他们每天清晨从新渡渡口摆渡而来，傍晚再摆渡回家。荆谷的学生不需要摆渡，但一天往返需步行8至10公里。直到第二年，才有少数女生借住在学校附近的村民家中。

村民家里可提供蒸饭，但不提供菜肴。学生自带大米、番薯丝和菜。学校没食堂，语文老师黄龙来自瑞安城关，当时50岁左右，他也只能靠一只煤油炉在寝室内独自开伙。

劳动：村头大队划拨十亩地，产出由国家收购

虽称“半农半读”，实际上学生每周仅劳动一天半，其余的为上课四天、休息一天半。村头大队划拨了两处共约10亩的山园和水田，供师生耕种。这些田地并非良田，产量普遍偏低。

农具方面，镰、打稻机、稻桶等大型器具由学校购置，锄头、镰刀、竹笠等小物件则鼓励学生从家中自带。学校还请村头大队的植保员林庆元担任农业生产专职老师，负责指导种植与管理。全体师生共

同参与劳动，不设考勤，也不记工分。

学生们至今还记得，当时种植的作物主要有早晚两季水稻、番薯和冬油菜。所有产出均由国家收购。由于学生以学习为主，所以产量一直不高。据估算，办学前后三年来水稻总产量不超过1000公斤。杨凤翔清楚地记得，第一年晚稻遭水淹，一种叫“29青”的品种大幅减产。后来碾米煮饭，或做成“年糕奶”夹油条充饥，味道竟不错——虽产量低，品质却好。

停办：教育改革推进，两届101名毕业生

随着教育体制逐步调整，初中开始试行三年制，马屿区普通高中开始扩大招生。顺泰农高未再招收第三届学生，仅于1976年和1977招收两届，合计共有101名毕业生。1979年，待学生全部毕业后，

学校随之停办。

这段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并未随时间消散。前年，两届学生分别举办同学会，重逢于曾经劳动与读书的土地上，共话那段半农半读的青春。

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

上善若水常处下 至德本在百姓家

富 民 文 明 和 谐 自 由 平 等 公 正 法 治 爱 国 敬 业 诚 信 友 善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